

继续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查鲁·马宗达

1965 年

译者三胖，校者阿穆利亚

我们必须采用区域性（area-wise）夺权的策略，每时每刻地同修正主义作斗争。某些修正主义思想在党内根深蒂固。我们必须与它们进行斗争。在此，我们来讨论几个问题。

（1）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目前已经变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苏联领导人对印度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完全支持。他们已宣布将在“四五”计划期间给予印度 60 亿卢比的援助。那种以为苏联的援助是在加强印度的独立性的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在这背后没有任何的阶级分析。我们应该在人民面前鲜明地表示反对援助的立场。

如果援助是给印度政府的，即那个和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展开合作的政府，那就是加强了反动阶级的实力。因此，苏联的援助不是在加强印度民主运动的实力，而是在加强同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与苏联勾结在一起的反动势力。我们正在印度观察到的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苏美合作——一个反对未来的人民解放斗争的撒旦联盟（satanic association）。从我们在印度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苏联的援助下，建立在大工业生产之上的大型垄断组织在公共部门的统治地位正在增强。因此，印度国家将无法通过公共部门的行业来控制垄断雇主的权力，而是后者控制着公共部门行业的生产。我们在钢铁和石油行业的经验都是这样的。

（2）目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极端狭隘的，而统治阶级最强大的武器正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不仅对中国使用这种武器，还在巴基斯坦等地方的任何问题上挥舞它。他们想凭借高举民族统一和其他口号来维护垄断资本的剥削。我们应该记住，印度的统一感（the sense of unity）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结果。随着印度政府继续向帝国主义妥协，这种统一感也正在从根上受到冲击。根本上，现今统治阶级所喊的统一口号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垄断资本剥削的团结。因此，这个统一口号是反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反对这个口号。“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为了掠夺的利益提出来的。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会支持这种口号。接受任何一个民族的自决的权利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基本

责任。在克什米尔、那加人^[1]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译注，争取民族解放的）战士表示支持。在与印度这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垄断组织的政府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将出现新的统一意识。为了革命的利益，保持印度的统一那时将是必要的。这将是牢固的统一。正是基于这种民族意识，印度南部一直有着反对强制推行印地语的斗争，在1965年，有60人为此失去生命。因此，如果贬低这种斗争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将使自己同广大群众的斗争隔绝开来。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应该支持这些为民族发展所作的努力。

（3）“在农民运动中运用阶级分析”。在当前的革命阶段，全体农民都是工人阶级的盟友，农民是印度人民民主革命中最强大的力量。只有牢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农民运动中前进。但是，并非所有农民都属于同一个阶级。在农民中主要有四种阶级——富农、中农、贫农和无地农民——还有农村手工业者阶层。根据生活条件的不同，他们的革命意识和工作能力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整个农民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始终努力建立起贫农和无地农民的领导权。对农民进行阶级分析时，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根据土地所有权契据来划分阶级。这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必须根据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对其进行分析。由于我们在整个农民运动中建立起了贫农和佃农的领导权，农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将变得激进。应该记住，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无论采取什么斗争策略，从任何意义上说，它都不是冒险主义。

应该记住，这些年来，由于我们将基础建立在非农民阶级的支持之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农民运动中的狭隘性，而每当镇压到来时，我们都以为一定是有冒险主义。应该记住，以根本要求（basic demands）为基础的农民运动都不会走和平道路。为了对农民组织进行阶级分析并建立贫农和无地农民的领导权，应该明确地告诉农民，反动政府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帮助他们解决根本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利用任何合法运动。公开的农会工作将主要是组织争取合法利益和改革的运动。因此，在农民群众中，党的最要紧也是最主要的任务将是组成党小组，解释土地革命纲领和区域夺权策略。通过这一纲领，贫农和无地农民将在农民运动中建立领导权。

（4）从1959年起，在印度的每一次民主运动中，政府越来越多地发动暴力袭击。我们没有领导过任何抵抗这些暴力袭击的积极反抗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每当遇到此类攻击，我们总是呼吁采取消极抵抗，例如“食物运动”（the food movement）之后的悼念游行。我们必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在群众的团结斗争中，若只是对

¹ 那加人：印度东北部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那加兰邦。

镇压进行消极的抵抗，就总是会走向投降路线。”因此，在当前时期的任何群众运动中，我们都必须组织起积极的抵抗运动。在任何群众运动之前，积极的抵抗计划是绝对必要的。在今天，没有这种计划而组织任何群众运动都意味着将使群众陷入消沉。由于1959年的消极抵抗，1960-1961年，在加尔各答无法组织起要求食物的群众集会。这种积极抵抗的组织将会在群众的思想中唤起新的信心，并将产生斗争的潮流。积极抵抗意味着什么？第一，保护干部。为了保护干部，必须有适当的庇护所和通讯系统。第二，向普通民众传授抵抗技巧，例如面对开火时趴下，或是借助一些坚固的屏障，制造路障等等。第三，在活跃的干部小组的帮助下回击每一次的攻击，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描述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初始阶段，按照他们的攻击比例，我们只能回击几次攻击。但是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取得了些许成功，广泛的宣传也会在群众中激发起新的热情。这些积极的抵抗斗争在城市、农村的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这个真理已经在美国的黑人抵抗运动中得到检验。

(5) 党内还没有关于地下组织的明确想法。如果仅仅是一小部分领导人留在地下工作，秘密组织是不会壮大的。相反，正是这部分领导者面临着脱离党的队伍的危险。如果党的领导者进入地下，却像公开的群众组织的领导者一样工作，那他们一定会被逮捕。因此，地下领导层必须进行建立秘密的党的工作。因此，建立秘密的党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地下领导层的任务，每个党员都应该为这个秘密组织工作。通过新的党员干部，党同群众的联系就会建立起来。只有这样，地下领导者才能够像领导者一样工作。因此，在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党员必须组建一个党的积极分子小组。这些积极分子小组必须热衷于革命政治。组建积极分子小组将是各方面所有党员的主要任务。我们何时才能将这些积极分子提升为党员，将取决于这些人能够吸引多少新的积极分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大量警察所不知晓的党员干部，而地下领导人在保持与党的队伍的联络中所存在的困难都将迎刃而解。

本文已经指出我们当中所存在的一些在政治、组织问题和群众组织等方面的某些修正主义思想。现在，党的成员必须重新思考每一次群众运动。在运动的方法方面，在组织的思想方面，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修正主义都已筑起了自己的巢穴。如果我们不铲除它，新的革命党就不能建立起来，印度革命的可能性就会受到阻碍。历史将不会原谅我们。